

智斗曹文庄,反贪局长“死磕”到底

在北京西城区,有一个在反腐败前沿冲锋陷阵的战斗集体——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。震惊全国的药监局系列职务犯罪案件,就是从这里“揭盖”的。

这个团队的领头人是39岁的反贪局长张京文。从走进检察机关大门那天起,他就以执著、努力地工作,诠释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。

反贪局长张京文



小局长 大案子

张京文是个既“小”又“大”的反贪局长。“小”,因为他身处国家检察机关最基层;“大”,因为他所查办的案件影响大,查处的贪官职务高。

北京西城区地域面积31平方公里,中央国家机关数十家,政府职能机构几十个,资产过亿的大型国有企业几百家。

2005年1月,反贪局查办了邮局工作人员以“回扣”方式伙同一家医院收发室工作人员贪污邮费10万余元的案件。这本是一起普通案件,然而蛛丝马迹瞒不过张京文:涉案嫌疑人负责维护的大宗客户单位有200余家,而这家公司只是其中邮费总额不算大的客户;嫌疑人不可能一人作案,或许会有其他人员参与犯

罪……经过进一步工作,案件有了突破,立案11件,涉及1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

张京文认为,这一案件反映出邮政系统存在违法手段竞争的现象,客观上形成了滋生犯罪的土壤。他的想法得到北京市检察院反贪部门的重视,全市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对辖区内邮政系统展开大规模检察。北京东城和海淀区检察院反贪部门相继查办了一批这类案件。

结案后,张京文邀请10余家涉案单位召开“邮局系统案件交流会”,开展犯罪预防工作。他还为邮政系统领导和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讲座,协助涉案单位建立和完善制度。反贪局为此发出检察建议13份,提出整改措施60余项。经过细致工作,邮局的大宗业

务客户并未因为查办案件而减少,邮资利润还有所增加;涉案单位邮寄业务的邮资下降了1/3。

邮政系列案的查办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,将刚刚出现在邮政行业的“潜规则”消除在萌芽状态,使邮政系统进一步健全了制度。

西检反贪局2003年查办的国内贸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陆昊兴贪污案、2004年查办的国家证监会工作人员王小石受贿案、2005年查办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受贿案、2006年查办的国家药监局系统“1·25”专案和北京打击医药购销领域专项行动案件等,都引起震动,使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管理规范,纠正了不正之风。

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机关

纪委书记荆江说:“企业发展是与风险斗争的过程,在打击和防范道德风险方面,西城检察院和反贪局给了我们很大支持。张京文局长的责任意识和工作作风,保护了企业的正当利益。”

2007年9月,西检反贪局在北京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评选中获“优秀反贪局”、“优秀反贪局长”、“优秀侦查员”。

“死磕”精神

张京文在办案中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“死磕”。

1989年毕业于分配到西城区检察院,张京文是当时基层检察院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。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,刻苦钻研业务。案子是“磕”出来的,大案是“死磕”出来的!“张京文说。

1993年,张京文由于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助理检察员,开始独立办案。在查办当时财政部农财司司长涉嫌受贿案中,嫌疑人亲属联名写信给检察院,说是被人陷害。此案一个关键行贿人家属突然拿出一份精神鉴定书,证明其患有精神疾病。

为了使案件水落石出,张京文组织北京精神病学医学界专家鉴定,还把自己“关”进了精神病院,观察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举止。通过两周“死磕”,张京文坚定了自己的判断:行贿人具有妨碍司法的重大嫌疑。医学专家组作出鉴定,证明此人并非精神病患者,案件最终成功办结。

张京文就这样带领西检反贪局打出了声威。在2006年北京市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行动中,好几次嫌疑人和证人说:“如果被西检反贪局盯上,真的就完了!”

“智斗”曹文庄

2006年夏天,原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案取得突破后,西检反贪局开始着手调查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涉嫌职务犯罪案件。

司长曹文庄获得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,他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《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》。面对这样的对手,案件侦查难度可想而知。张京文带着他的团队又开始“死磕”。

三伏天,张京文带着4名侦查员对曹文庄展开调查。他们躲在车里“蹲点”,不开空调不开窗,衣服被汗水一次次浸透。然而初查结果让人困惑:曹文庄名下无房无车,也无巨额存款,上下班坐地铁,周末没有应酬,不时拎着球拍去锻

炼身体。

张京文和几名侦查员憋在办公室里,一遍遍研究分析。难道曹文庄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“如果我曹文庄有问题,国家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”,难道群众举报都失实?

大量信息中,他们终于发现了疑点,张京文果断决定改变侦查思路。夏去秋来,外调组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:曹文庄以亲属名义购置了2处别墅;他的妻子在担任一家国有医药公司副总的同时,还任一家私营医药企业股东;这个医药企业成分复杂,来往账目上有大量可疑资金;与曹文庄关系密切的刘某曾是曹的同事,此人素以“能办事、有路子”在医药圈内闻名。

案件突破点被锁定在与曹有20多年朋友关系的行贿人刘某身上。张京文和预审小组研究制定了“晓之以情、动之以法”的方案。在强大证据和政策压力下,刘某和曹文庄败在反贪检察官面前。

在任局长4年中,张京文是局里加班最多的人。同事知道,上小案子,局长经常在案件指挥中心;上大案子,局长经常在承办人办公室;上重大案子,院里就见不到局长了。此时,他会与侦查员一起在现场蹲守,亲自驾车抓捕嫌疑人。

张京文心很细,他在工作日历上把局里每个同志的生日画上记号,提醒自己送上一份小礼物;他的抽屉里放着所有同志的体检结果,工作之余还想着为同志们安排休假和锻炼计划……

这就是张京文,一个普通的基层检察院反贪局长。

新华社记者 牛爱民 李京华 (新华社专稿)

妈妈走了,爸爸领4个“黑”孩子流浪

重庆市开展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后,住在渝中区南纪门善果巷的牟元伦一家遭遇市民举报。牟元伦被举报,是因为他有4个“黑孩子”。不过,他今年18岁的大儿子牟文魁,今年9月由警方在大渡口区某医院查到了出生记录,从而登记上了户口,改变了“黑孩子”身份,随后外出打工。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依然没上到户口。由于是“黑孩子”,他们没有上学,成天四处流浪。

父母没领取结婚证

牟元伦的4个孩子是私生子。他们来到人间的时候,爸爸牟元伦和妈妈谢大美没有结婚。邻居说,当时牟元伦还有一点钱,在较场口买了间18平方米的房子,生活还算过得去。后来,牟元伦一直没工作,收入越来越低,谢大美就离开了这个家。两个人的关系因此变得非常恶劣,互相指责。谢大美说,牟元伦好逸恶劳,即使垃圾在脚下也不会弯腰去捡,而是指使孩子去做;他还酗酒,打过她很多次。老牟却说,谢大美是在编故事,她“在外边有了人”,就变了;每天早上,谢大美要抽几根烟才起床,还要喝酸奶。

2003年11月,记者曾走进这个家庭。当时,年仅8岁的小儿子哭着说:“妈妈走了10天了。妈妈,我们不要户口了,我们不怪你,你回来吧。”直到现在,妈妈都没回来,是老牟一个人把孩子养大。

家里搭三层高低床

近日,记者再次走进他们的家。由于是非婚生子,再加上超生等缘故,4个孩子没上过一天学,在一天又一天的嬉戏等待中,就长到10多岁了。

老二今年17岁,嘴角长出了淡淡的胡须,身体越来越强壮,成为男子汉了。

老牟的家说起来有18平方米,但真正的使用面积只有9平方米左右。5个人,搭了3层高低床,邻居送了一些被子,才勉强凑合着睡觉。老三是个女孩,正值青春期,和哥哥弟弟在一起,越来越不方便。

牟元伦刚刚申请了低保,已通过审批,但第一笔补助还没拿到手。大儿子上了户口后,在大渡口区打工,除去生活费,每月能剩200元左右。

另外3个孩子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,长期吃不上肉,脸色越来越差。老牟偶尔上街当力哥,也挣不了啥钱。

“黑孩子”的理想

即使是在如此贫穷、没有户口的生活当中,“黑孩子”们依然乐观。

他们在简陋的巷子里自学,趴在砖头上看书;在喧嚣的马路边捡垃圾,在寒风呼啸中流浪;他们冷静地讲述妈妈和爸爸的故事,希望他们能够和好;他们希望上学、上班。人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,他们的理想,理应如此灿烂。

3个“黑孩子”长得眉清目秀,看上去非常聪明。老二



牟元伦家里搭了三层床铺

每天早上会沿着滨江路跑步,一边跑一边捡垃圾。他的理想是当厨师或开飞机。从今年7月起,他询问了多家饭馆,希望先当学徒,不要工钱,一边打工一边学手艺。但每家饭馆都给他这样的答复:你没有户口,没有身份证,我们不能要。

老四今年已12岁,他的理想是当记者。他喜欢看连环画,每天晚上,老牟都会给他讲课,教他学习汉语拼音和数学,现

前来探望,也没办法,3个孩子都是非法生育,按政策不能吃低保,还要对老牟进行处罚。老牟家徒四壁,属于特别贫困家庭,怎么处罚他?

南纪门派出所户籍民警表示,按照法律规定,必须找到这3个孩子和牟元伦的关系证明,才能上户口。如果没有医院的出生记录,就必须做亲子鉴定。据悉,每一例亲子鉴定要3000元左右,3个孩子共需9000多元,老牟根本拿不出。

老牟说,他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感到非常后悔。但孩子是无辜的,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回到娘肚子里。老牟这一生经历了很多风波困苦,今年已51岁,现在唯一的希望,就是3个“黑孩子”能健康成长,全家过上稳定的生活。

全家曾流浪数万公里

牟元伦说,谢大美离开他们后,嫁给附近一个男人,两家人经常碰到,每次相遇都要吵架。为了孩子健康成长,他们全家人决定外出流浪。

2004年7月,老牟将家里电视机卖掉,买了一辆板车,驮着被子、锅、碗等器具,走出主城区,经綦江、黔江,到贵州、湖南、江西等地步行流浪。一路上,他们靠捡破烂和沿途市民的施舍度日,晚上在板车旁搭帐篷睡觉,白天在野外垒灶煮饭。整整走了3年,今年7月,步行数万公里之后,才回到重庆。

这3年里,有时会遇到刮风下雪,有时烈日炎炎。而最难的是遇见陡坡,板车拉不上去。牟元伦在前边拉,4个孩子在后边推,依然纹丝不

动。他们只好把行李卸下来,先搬到陡坡高处,再将空板车推上去。翻越贵州九道坡时,他们走了整整4天,4个孩子脚底磨出了血泡,结成老茧,一层又一层。

一路上有无数好心人资助他们,给他们送米、油、被子、衣服等。每到一地,当地的民政部门就劝老牟:带着孩子这么流浪,不是办法,应该尽早回重庆,让孩子上学,过安定日子。

记者手记

孩子是无辜的

两人没结婚,家又这么穷,竟然生了4个孩子。听了这件事的人,都表示非常吃惊。

渝中区计生委表示,按照政策,即使4个孩子已经长到10多岁,仍然要进行处罚。渝中区政府对老牟全家非常同情,但你没户口,怎么证明你的身份?

孩子是无辜的。父母千错万错,只要孩子来到人间,就有生存发展的权利。当我得知3个孩子依然没有上到户口,依然没有上学的时候,百感交集。这是因为亲情的冷漠,还是因为别的?时隔4年,当我重新踏入他们的家门,再次感受孩子的痛苦时,我感到无比惭愧。

我也听说过,在农村,在城乡接合部,有许多超生的孩子不能上户口。他们的父母违反了计生政策,就把孩子藏起来,甚至委托他人抚养。这种行为,可能引发亲情和法律冲突,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,甚至可能酿成悲剧。政府一方面应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处罚,另一方面也应给“黑孩子”以关爱。因为,孩子是无辜的。重庆晚报